

文学及语言

[“强制阐释”专题讨论]

真理与方法：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再反思

高文强

【提要】古代文论现代学科的建立深受西方现代学科体制的影响。因此，古代文论现代研究便先天具有“理论预设”的根性。这使得古代文论现代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强制阐释的现象。如何避免这一似乎不可避免的现象呢？本文借鉴禅宗面对佛教中类似问题的解答方法对此问题做出了尝试性回答。

【关键词】古代文论 理论预设 强制阐释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6)01-0105-05

对古代文论现代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这些年曾在一些文章中有所反思。^①最近，关于“强制阐释论”的讨论，在国内文论界进行得如火如荼，并引起国际文论界的关注。在这场大讨论中，西方文论“强制阐释”中所表现出来的“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等特征，^②成为人们反思西方文论理论缺陷的焦点。这场大讨论中所触及的现代文论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对笔者深有启发。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论主要是以西方文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深受这一理论体系的影响。因此，“强制阐释”问题，绝不仅仅存在于西方文论之中，深受西方文论影响的中国现代文论中同样存在此类问题。而频受现代文论体系“引导”的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是到了对古代文论现代研究进行反思与清理的时候了！

本文在此欲就笔者在“强制阐释论”讨论中所受启发，谈一谈古代文论现代研究中值得反思的若干问题。

一、从“刘勰是个什么家”说起

关于“刘勰是个什么家”的问题，台湾著名龙学家王更生先生早在20年前便做出了明确回答。1996年王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撰文，题目便是《刘勰是个什么家？》。在这篇文章

① 参见拙文：《通变辨义》，《文心雕龙研究》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154页；《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失语·转换·正名——对古代文论十年转换之路的回顾与追问》，《中国文论的史与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6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64页；《从〈文心雕龙〉的传播看刘勰身份定位的嬗变》，《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②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章中,王先生从现代学术研究视角论证并得出了“刘勰为中国文学思想家”的结论。^①

对此问题的回答,或可推得更早一些。1943年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部书里罗先生认为刘勰是一位“成功的、伟大的文学批评专家”。^②在今天学术界的习惯中,“文学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内涵大体是一致的。从罗根泽先生到王更生先生再到今天的学术界,可以说,刘勰是一位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这一结论,已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界的共识。同时,这也成为现代学术界研究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一个前在定论。

然而,如果我们来一次历史穿越,回到刘勰生活的那个时代,或者再到唐宗宋祖时代来一番巡礼,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些时代人们眼中的刘勰,并不一定是我们今天所下定论的那个形象。

比如刘勰生活的齐梁时代,是一个文人集团递相转换的时代。文人们在集团内参与各种文学及文化活动,或同题竞写,或酬唱往来,或相互问学,或集体弘法,并由此留下了大量与之相关的诗文作品。然而,从目前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来看,无论是在齐梁文人集团的各种活动中,还是在他们往来而作的各类诗文中,都难觅刘勰的身影。而在今天流传下来的刘勰的所有作品中,我们也很难发现他参与文学集团活动的踪迹。刘勰对于齐梁文坛而言,似乎只是一位旁观者。虽然刘勰曾想以他的《文心雕龙》求誉于“时流”,但最终却“未为时流所称”。^③在齐梁文坛这个领域,他基本上默默无闻。但是,与在文坛上的默默无闻相反,刘勰在齐梁佛教界却有着相当的声誉。他成年不久即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④与在文坛活动中难觅身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齐梁的佛教活动中,刘勰却常常是一位代表人物。虽然《文心雕龙》未为时流所称,但是刘勰之佛学修养及其为文之水平却在京师佛教界颇负盛名。《梁书》本传言其“为文

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或许正是由于刘勰在佛教界的盛名,其晚年才被武帝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功毕后于寺中幡发出家,并终于佛门。因此,在齐梁学者眼中,如果刘勰能够称为一个“家”的话,那么他应该是一位“佛学家”,而不是一位“文学批评家”。

再如唐宋时期,刘勰的身份又开始向文学转变,刘勰在人们眼中逐渐由“佛学家”转变为“文学家”。至明清,其身份更是进一步转变为“诗评家”。至此,刘勰的身份始与现代“文学批评家”较为接近。这些身份转变的具体过程,笔者曾有专文详细论述,可供参考。^⑤此处不再赘述。

显然,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刘勰都不是以一位“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而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学术界却一致认定刘勰是一位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呢?

我们知道,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刘勰身份的不同认定,代表的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刘勰其人以及《文心雕龙》其书的接受状况,同时也代表了刘勰其人、《文心雕龙》其书在那个时代的影响状况。今天的学者一致认定刘勰是一位伟大的“文学批评家”,最主要的原因是今天的学术界视《文心雕龙》为一部伟大的文学批评著作,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尽管其于世时的文学批评活动不很闻名。《文心雕龙》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更符合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所约定的规范和标准。

显然,在研究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之前,

① 王更生:《刘勰是个什么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②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③ 《梁书·刘勰传》。

④ 《梁书·刘勰传》。

⑤ 详细论证参见高文强:《从〈文心雕龙〉的传播看刘勰身份定位的嬗变》,《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我们已预设了一套理论规范和标准，并以此去框定和品评历史中的所谓批评家和批评活动。刘勰是幸运的，虽然于齐梁时“未为时流所称”，但在现代他却找到了知音。不过，这种方法先行的研究模式所获得的结论，往往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同时也会遮蔽文论发展史中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些问题。比如现代研究中给予崇高地位的《文心雕龙》为何在齐梁文坛却影响甚小这一问题，就被我们有意无意给忽略掉了。我们宁愿相信是那个时代文学家们的文学观念乃至门第观念存在一定问题，而不愿反思我们的现代研究在方法上有何不妥。再如对刘勰历史地位的过高评价、对《文心雕龙》历史影响的过高评价，以至于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史地位的过高评价，^①无不与这种“理论预设”的阐释方式相关联。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在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存在，而且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中都普遍存在。

二、理论预设：古代文论现代研究的基本根性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可称为古代文论）学科的建立，始于20世纪20年代，一般人们认为，以1927年陈钟凡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标志。这个时代是中国现代学科体制建构的大时代。众多现代学科都开始于此时代，而且这些学科的建构无一例外地向西方学习借鉴。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自然也是如此。

朱自清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诗言志辨》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并将小说、词典都放进文学史里，也就是放进‘文’或‘文学’里。……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称为‘诗文评’的，也升了格成为文学的一类。……从目录学上看，……诗文评的系统著作，我们有《诗品》、《文心雕龙》，都作于梁

代。可是一向只附在‘总集’类的书尾，宋代才另立‘文史’类来容纳这些书。这‘文史’类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②早期的古代文论学者便意识到，古代文论现代学科的建立，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从学科规范到研究方法都深深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

我们以朱先生所说的“文学”这个概念为例。在古代文论现代学科体制中，“文学”这个概念直接引自西方文化。显然，其所规定的内涵与外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或“文学”的规定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朱自清先生才感叹，西方文化改变了我们“文学”的意念，小说、词曲和诗文评都升格成为文学的一类了。但是，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虽可引进和改变，而现代“文学”观念与古代“文学”观念的差异却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当我们用今日之“文学”观念去研究古代所谓“文学”批评活动时，两个概念的错位便很容易引发阐释的错位。“文心”之“文”与现代“文学”概念有交集，但差异更大。那么，刘勰论“为文之用心”，与现代“文学创作方法”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吗？如果我们以现代学科体制中所谓规范的方法和理论去研究《文心雕龙》，强制阐释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一位学者所担心的：“当中国学者接受了各种西方思想理论和方法，并用之以梳理、整理、规范、命名中国古代文献材料，按照现代学科分类标准撰写出诸如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著作时，‘以今释古’或者‘强制阐释’的问题就必然地普遍存在了。”^③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国现代学科体制与西方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方式，就会发现这位学者的观点并非危言耸听。当然，我们这里主要

① 已有学者注意到此问题，参见刘文勇：《魏晋南北朝“文论高峰说”献疑》，《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③ 李春青：《古代文论研究中阐释的有效性》，《文艺争鸣》2015年第9期。

是以人文学科为例。西方人文学科体制是建立在其学术史的正常发展基础之上，有着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学科体制的合理脉络。中国现代人文科学体制的建立却与之正好相反，我们是向西方借鉴分类方式、体制规范、理论观念、研究方法等等，然后再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这种建构方式最大的“优点”便是“理论先行，方法优先”。不像西方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构有其自然发展的历程，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立之初便面临这样一种尴尬：我们建立了一种历史学科，而这种学科在历史中几乎不存在。毕竟“诗文评”的分类方式至明代才开始出现。即便如此，它与“文学批评”也非同一个概念。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是我们应用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强制”建构起来的。正因如此，我们的古代文论现代学科体制便天然具有强制阐释的根性。

那么，在无法逃避的现代学科体制下，我们的研究又如何能避免强制阐释呢？这的确是个问题。

三、面向真理本身：古代文论研究的当代立场

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然无法逃避，又能如何解决？这不禁让我想起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类似情况。

佛教入华时同样是“理论先行，方法优先”，佛教徒对修行方法的重视往往超过了对终极目标的追求。佛教追求的本是无执著的境界，修行方法原本是帮助人们达到这一境界的工具和手段，但当人们专注于修行方法而忽略终极境界时，这些工具和手段反而会成为人们达到境界的障碍。这是惠能开创禅宗前中国佛教界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许多佛教徒堕入“灭尽贪执亦是执，已处执著却不知”的境地还以为自己依然走在正道之上，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①便代表当时佛教徒的一种普遍追求。面对这种现象，

惠能开创的禅宗一派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境界与方法被倒置的问题，从而使许多佛教徒又回归到追求无执著境界的正道之上。

古代文论现代研究中存在的理论预设现象，与佛教中的境界与方法倒置现象非常相似。学术研究追求的本是学术真理，研究方法是帮助我们获得真理的工具和手段，但当我们专注于研究方法而忽略学术真理时，这些工具和手段反而会成为我们获得真理的障碍。因此，这里我们借鉴惠能解决佛教中境界与方法倒置现象的方式，来尝试解决古代文论研究中的真理与方法倒置问题。

（一）明心见性：回到真理本身

佛者，觉也。佛教追求的终极境界原本就是一种内心的觉悟，所以佛不在身外，佛就在心中。这是“明心见性”的第一层内涵。惠能用这一方法欲破除的是人们对外在目标追求这种不易自知的执著。“明心见性”的第二层内涵是说，人的原初之心本就是无执著之心，亦即本就是觉悟之心。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修出一颗觉悟之心，而是让原初本心呈现出来，即“见性”。惠能用这一方法欲破除的是“修心”这种人们最易堕入的执著。“佛心”不是修来的，也是修不来的，它原本就在那里。人们要做的只是令其呈现即可。“明心见性”这一方法最根本的任务其实就是让人们回到无执著境界本身，而且应清醒地意识并回避那些人极易堕入执著而不知的工具和手段。

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如何规避强制阐释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借鉴“明心见性”之法。当然，此处所“明”之“心”指的是古代文论中所包含的真理。古代文论中的真理不在“身外”，而就在古代文论材料之中。在关于“强制阐释论”的讨论中，有学者呼吁文学理论要回到文学本身。古代文论研究同样应回到古代文论本身，

^① 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而不应成为某些理论和方法的实验场。此外，古代文论中的真理原本就存在于材料之中。研究者要做的不是运用何种方法、如何阐释这些材料，而是要令古代文论材料中所包含的真理呈现出来。简言之，“明心见性”之法强调的是：古代文论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呈现真理，而不是某些理论方法的附属品。

（二）顿悟成佛：于法而离法

如何让无执著的“佛心”呈现出来呢？有什么方法呢？惠能给出的方法是“无念、无相、无住”，这一方法即顿悟之法。我们知道，三者之中“无住”是核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①是使“佛性”呈现的根本方法。如何做到“无住”？惠能以“无念”、“无相”为例做了说明，即“于念而不念”、“于相而离相”。也就是“不落一边”，也就是“中道”。惠能顿悟法的实质是告诉人们，使“佛心”呈现的方法或许有无数种，但无论用哪一种方法，都不要为其所缚而本末倒置。因此，对于方法的态度应是“于法而离法”。

惠能的顿悟说对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很有启发。以“理论先行，方法优先”为特征建构起

来的古代文论现代学科体制对于我们每位研究者而言，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呈现真理、认识到方法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达到这一目标，在方法的使用中能做到“用法”而不“缚于法”、能做到“于法而离法”，那么，古代文论现代学科体制中存在的“理论预设”的先天缺陷，就对我们的研究毫无影响了。简言之，“顿悟”之法要求我们在古代文论研究中，对真理与方法的关系应有一个清醒地把握——只要我们能做到不执著于方法、做到“于法而离法”，那么任何方法都可能成为我们追寻真理的工具和手段，无论它是预设的还是后来的。

本文作者：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左 杨

^① 语出《金刚经》，参见《佛教十三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页。

Truth and Methodology: A Further Reflection on the Modern Research into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Gao Wenqiang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s a modern discipline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modern discipline system. Therefore, the modern research into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has an innate nature of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 which inevitably results in imposed interpretation. How can the seemingly unavoidable phenomenon be avoid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by learning from the way Zen adopts when confronting similar problems in Buddhism.

Keywords: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 imposed interpretation